

荷兰对汉学研究的贡献

[荷兰]戴闻达^①讲演 马军译注

汉学研究的发展史就是发现新大陆的历史。实际上,新大陆的发现其本身就是汉学研究的直接结果。我们知道,哥伦布读过马可·波罗的书,从中了解到遥远东方的 Cathay 和 Zippangu 的奇异故事。为此,他在地圆论的假说下,大胆地向西航行,试图寻找中国和日本,结果偶然间却碰上了美洲,但他却确信这就是印度。如果不是汉学研究的萌芽引发了这个天大的错误,那么如今的美利坚合众国就无从谈起了。

当然,这不是我要谈的主要话题,然而我必须回顾这一历史事件,以此加强对远东国家遥远和神秘的生动想象。通过两个传统渠道,西方隐隐约约知道了它们。其一可以追溯到古代,通过内陆的丝绸贸易,可以得知 Seres,意思是丝绸之人。通过经印度的海路,可以模糊地了解 Sinae 之国。Sinae 这个词曾经被托勒密(Ptolemy)^②使用过。其二则来自中世纪,当蒙古人统治亚洲大部分地区时,商人和传教士们能够安安全全地来往旅行,甚至出乎今人的想象。最有名的人物是马可·波罗,他曾长住在忽必烈汗的宫廷里,后者那时不仅是中国皇帝,也是亚洲大陆的唯一主人。

然而,这个国家通常被称为 Cathay,其得名于 8 世纪中国东北一个强大的游牧部落。从 9 世纪到 11 世纪,他们建立了契丹帝国,又称辽朝,公元 907 年到 1125 年统治着中国北部。即使在辽灭亡以后,穆斯林的史学家仍用 Cathay 指称统治华北、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公元 1115 至 1234 年)。蒙古人在征服中国南部以前,很早就占据了华北,因此 Cathay 之名就和这个国家以及 Sin(Sina)联系在一起。至于 Sin(Sina),如果被用的话,仅仅指的是中国南方。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托勒密说的 Sina 和中世纪旅行者们提到的 Cathay 实际上是同一个远东国家。

近代以后,通向远东已不再经内陆,而是由海路。当葡萄牙人发现通向印度的正确之路后,他们很快将活动推进到中国海岸。然而隔膜重重,尽管中国人知道葡萄牙人凭借武力已在马六甲等地立足,但一点也不急于与那些无名的蛮夷打交道。直到 16 世纪中叶,葡萄牙人成功地在澳门小半岛上建立据点,开始了正常的贸易,他们才知道对方是 Sinae(中国人),而早期关于 Cathay 的各种记载似乎已被遗忘了。

我们应当把荷兰关于中国的第一个报告归功于这些葡萄牙人的接触。一个富有进取心的年轻人曾为葡萄牙人服务,他来自须德海(Zuyder Zee)上的小镇恩克赫伊曾(Enkhuyzen),1568 至 1588 年间曾两次随葡萄牙人前往澳门。归国之后,他的观察报告被同乡 Lucas Jansz. Waghenaer 收录在其名著《航海财富》(Treasure of Navigation)里,该书 1592 年出版于莱登(Leyden)。里面这样写道:

中国人生活优裕,该国盛产黄金、宝石、各类丝绸、珍珠、珠母贝、樟脑、水银、大黄、金线、麝香,以及你可想象的一切东西,甚至你会想用一艘 300 last^③的船来装……居民们在庙里安放魔鬼般的偶像,对其顶礼膜拜。他们的指甲留得很长,因为不被允许携带武器。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很高,他们吃各种各样的食物,尤其偏好狗肉。他们喝食米酿制的酒,直至喝醉。然而,他们都是些聪明人,知道如何制作各种精巧的物品。

^① 戴闻达(J.J.L.Duyvendak, 1889—1954年),荷兰汉学家。1912年来华在荷兰使馆工作,1918年回国后任莱登大学汉学研究所会员、教授。著译有《商君书》(The Book of Lord Shang,1928),《马欢重考》(Ma Huan, Reexamined,1933),《1794—1795年荷兰赴华使节记》(The Last Dutch Embassy to Chinese Court,1794—95,1938),《中国发现非洲》(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1947),《道德经》(Tao tō king,Le Livre de la voie et de la vertu,1953)等书。本文是他1950年3月20日在英荷学会(Anglo-Netherlands Society)和中国学会(Chinese Society)联合上的发言稿,刊英荷学会的会刊《英国和荷兰》(Britain and Holland)。

^② 托勒密,生活于公元2世纪,出生于埃及的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数学家。

^③ Last,重量及容量单位,约合4000磅。

从果阿（Goa）返国的漫长途中，Pomp 是与一个有趣的人同行的，此人是他的同乡，名叫 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1563—1611 年）。作为一个 17 岁的少年，他渴望了解外国的消息，先是到了西班牙的塞维利亚（Sevilla），几年后又得以充任果阿大主教的随员。果阿是当时葡萄牙殖民帝国的一大中心，在那里他尽力收集有关东印度群岛的材料。主要的资料来源是大主教的档案室，后者对他很信任，因此得以查阅到葡萄牙人试图隐瞒的大量信息。可以想象，这两个人一同坐在葡萄牙大帆船那起伏不定的甲板上，交流着远行的葡萄牙人征服或与之贸易的那些神秘国度的信息。

Linschoten 回国后，出版了两本重要的书，详细地说明了赴印度与中国的行程、各国的状况和进行贸易的可能性。其一是《葡萄牙人东方旅行记》（*Travel-account of the Portuguese to the Orient, 1595*）。其二是《路线》（*Itinerario, 1596*）。前者的出现正好为 1595 年荷兰人的首次航行提供了重要指南，他们经好望角到达了印度。

这一航行是在 Cornelis de Houtman 的领导下进行的，共持续了 3 年。虽然他们没有到达爪哇以远地区，但是在巴丹（Bantam）停泊时，却曾遇到那里的中国人。Houtman 这样描述：

我们的船到达巴丹后，他们每天都有大批的船只涌来。他们在我们的甲板上设摊，销售丝绸、丝线和瓷器，甲板拥挤得简直寸步难行……这些中国人都非常能干、勤劳，不怕辛劳，拼命挣钱……确实很象我们国家的犹太人。他们信仰什么呢？

在他们的屋子里放着很大的神像，他们焚烧香烛向其祈求不要加害自己。神像越可怖，就越受到崇拜。

经过三年的漫长航行，船员在极度疲惫和虚弱状态中回到了祖国。当时的情形正如：

十六个人在死人的胸膛上

吆——喝——喝，一瓶浪姆酒。

喝吧，其它的事，魔鬼已经干好了。

吆——喝——喝，一瓶浪姆酒。

更糟的是，Houtman 的远航招来了许多批评，股东们对这次冒险换来的低微回报很不满意。

我不必在这里叙述荷兰与印度的直接贸易及其殖民帝国是如何建立的，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其中的一点。

在 Houtman 带回国的奇异物品中有一些书籍，它们被存放到新成立的莱登大学图书馆中。其中有中文书吗？在该图书馆拥有的古老汉籍中，没有一本可证明是来自那次航行的。但是，我们还是有可能在牛津至少找到一本。

不久以前，在波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曾发现一本稀有的中文残本，双面印着图画。扉页上有这么一行字“这本书是在莱登时，历史教授 Merla 博士送给我的”。还有一些字是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①写的，1665 至 1701 年间他是波德林图书馆的管理人员，1683 年曾和一个叫沈福宗^②的中国人一同工作。沈是由耶稣会士柏应理神父（Couplet）^③带至欧洲的。海德试图搞清楚此书的性质，但这是一个残本，所以没有成功。实际上它是很容易辨别的，来自通俗小说《水浒传》。赛珍珠（Pearl Buck）^④后来将其译成英文，书名是 All Men are Brothers（四海之内皆兄弟）。Merla 博士，确切地说是 Merula 博士，他是莱

^① 托马斯·海德，英国东方学家。

^② 沈福宗，出生于景教徒家庭，后入耶稣会，教名 Michel Alfonso，随柏应理赴欧，1687 年到达牛津大学，1692 年死于非洲莫桑比克附近。

^③ 柏应理（1623—1692），比利时耶稣会传教士，1658 年来华，1680 年返欧，1692 年在二次来华途中遇难而死。

^④ 赛珍珠（1892—1973），美国女作家，长期在中国生活，1938 年以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获诺贝尔文学奖。

登大学的第一个图书管理员，是他将残本给了一个不知名的英国学者。博士死于 1607 年，因此该书到达莱登应在在此之前，因此很可能就是 Houtman 带回的。它非常普通，显然来自爪哇的中国旅行者之手。总之，这是我们所知的最早到达莱登的中文残本。我得说 Merula 博士作为一个慷慨的主人要比当图书管理员更好！如果我们悲叹莱登的损失，那我想残本呆在牛津至少要比其他地方要好。

到此为止，荷兰人收集的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信息都是实用性的，它带有海水的咸味，依赖水手们的勇敢和艰苦的航海实践，但学术意义上的汉学尚未点燃它的灯芯。现在我将讲述汉学研究的真正开始，其创始人是 Justus Heurnius。

Heurnius 的父兄都是莱登大学教授。学了医学以后，他被神学所吸引，充满了改造异教徒的热忱。1624 年他决心前往东印度群岛，出发前出版了一本奇特的书，书名是 *De Legatione evangelica ad Indos capessanda admonitio*（莱登，1618 年版），解释了最佳的传教方法。应该一提的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传教士，他很好地理解了使用土语在对外传教中的重要性。他也提到了中国，认为那就是《圣经》里提到的“十个走失的部落”（Ten Lost Tribe）的国度，需要向他们传播救世福音。为了表明这一想法，他引用了先知以赛亚的话：“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圣经·以赛亚书》第 49 章第 12 节）

他在巴达维亚任职期间，并未忘记关注中国。一次他幸运地认识了一个曾在澳门向天主教传教士学习过拉丁文的中国人，于是便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学习中文。1628 年 11 月 2 日在一封写给东印度公司董事们的信（我们很幸运地保存着）中，他这样写道：“在一个懂拉丁文的中国人的帮助下，我们编写了一本词典，先列出荷兰文和拉丁文词语，在旁边标上汉字及其用法。同样的，我们还把信条、十诫和主祷文译成了汉文，并附上基督教的简介。我们克服困难如此行事，是因为这样的中国人是不易找到的。一旦对华贸易开始，我们希望这本词典将有巨大的用处。

Heurnius 将它和其它文稿一同送给了任莱登大学教授的哥哥。它们后来怎么样了？几年以前当我回顾这段历史时，我当然很想知道荷兰汉学的第一个成果是否还存在着。然而，它们似乎已经散失了。按常理，如果有什么东西找不到的话，最好到大英博物馆（*Britain Museum*）去搜寻一下。果然，在东方文献室（*Oriental MSS and Books*）主任翟林奈（*Lion Giles*）博士^①的善意帮助下，我在那里找到了它。就像莱登的第一本中文书到了牛津一样，荷兰汉学的第一个成果到了伦敦。令我稍感宽慰的是，后来发现，我们至少也存有一个复本，也是 Heurnius 写的，其中的拉丁文被省略了，但加了一组其他文件。

在这本词典流落到伦敦之前，有一段时间它曾保留在莱登大学东方学者 Jacob Golius（1596—1667 年）的图书馆里。此人非常出色而且有意思，与同时代的许多人相比，他多才多艺，涉猎广泛，在近东呆过多年，对其深有研究。1625 年被任命为阿拉伯学教授，4 年以后又当上了数学教授。

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东方学研究和数学研究是紧密相关的，因为穆斯林世界在数学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步。Golius 及其前辈们对编年制度特别感兴趣，在对阿拉伯和波斯的研究中，他们对编年里的 *Catayan* 制度非常感兴趣。1437 年一部关于不同历法、编年制、行星运动和恒星位置的巨著在波斯编辑而成。此书建立在波斯学者纳绥尔丁（*Nasir-al-Din al Tusi*，1201—1274）旧著的基础上，他是蒙古旭烈兀汗（蒙哥汗和忽必烈汗的兄弟，曾于 1258 年攻陷了巴格达）的宠臣，因此有许多机会了解中国的编年制。他用阿拉伯字母标出了中国时间划分的读音，这些循环的符号由 10 个天干和 12 个地支组成，60 年一个循环，由此构成了中国编年的基础。通过 1437 年的这部著作，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西方的东方学家获得了上述知识。

对这些循环文字最早感兴趣的是 1593 年起任莱登大学教授的泰斗 Josephus Scaliger

^① 翟林奈(1875—1958)，英国汉学家，1900 年入大英博物馆管理东方书籍。

(1504—1604)。他的后任 Salmasius (1588—1654) 已经能对它们做出解释。有关这个问题的最佳之作出版于 1650 年，作者是 1642 至 1648 年任牛津大学教授的 John Greaves。他给出了一张用阿拉伯字母和罗马字母标音的 12 个地支和 10 个天干表，以及一张 60 年轮回表。他还用中文写出了一张与 12 地支相对应的 12 种动物生肖表，此外还有中国的 24 个节气表和 12 个词组表，后者被用在日历里，为的是显示吉日和凶日。

Golius 通过亲自与当时一位真正的中国问题专家相接触，得以解释了上述图表中的晦涩之处。这是莱登大学汉学工作的真正开始。

碰巧此时，卫匡国神父 (Martino Martini)^① 被派回罗马来阐释耶稣会士在“礼仪之争”上的观点。他到达了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呆了几个月。他要向《中国全舆图》(Novus Atlas Sinensis) 交由著名的 Blaeu 印刷所印刷。该舆图取自中文资料和他的亲自观察。Golius 长久以来一直渴望能遇到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当他听说卫匡国在阿姆斯特丹时，决心无论如何都要见到他。得知卫匡国忙于地图的出版，Golius 准备等事情完毕后再说，他希望卫匡国能给他时间。不巧的是，卫匡国急着去南方。他给 Golius 的全部时间是途中在莱登的短暂停留。Golius 期待着这一机会，终于有所收获。显然，坐拖船而来的卫匡国要在莱登换乘一首驳船，两位学者会面的时间取决于驳船出发的早晚。会面虽然短暂，但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Golius 要求解释的主要问题是 Cathay(契丹)和中国是不是同一个国家？所以他向卫匡国读了纳绥尔丁表中 Catayan 十二循环的波斯发音。他刚刚读了前三个，卫匡国就认出了那是中国的 12 地支，并随即用中文说出了后头的 9 个。然后，24 个节气也被识别了出来。显然，纳绥尔丁表格里的译音与汉语的发音完全一致。这令两位学者都极为满意，也使在场的人们发出了感叹。我乐意设想那次会面的场景：在河边的酒店里，庄重的教授身旁围着他的学生们，和蔼、谦恭的卫匡国则尾随有一个名叫 Dominicus 的中国仆人，他是一个知识丰富的年轻人。这确实是个重要的时刻，两股学术首次碰面，一个从近东来到莱登，在蒙古征服的遥远日子里便有了根基。另一个刚刚来自远东，代表的是耶稣会士正在建立的新型知识。

波斯的 Catayan 表刚好与卫匡国熟悉的中文表想对应，这是证明 Cathay(契丹)就是中国的强有力证据。虽然在此许多年，从 1603 到 1607 年一个叫鄂本笃 (Bento de Goes) 的传教士，在经历了从印度到中国内陆的特殊旅行后提出了这一观点。^②但这只是在传教士圈内流传，东方学学者们还不知道。

途中的首次而简短的见面成果非凡，意义深远。两位学者打算在安特卫普进一步会谈，卫匡国将在那里呆 8 天。1654 年 6 月 9 日 Golius 出发了，他受到了友好的接待，有丰盛的食物和愉快的漫步。他不受干扰地聆听了许多关于中华帝国的事情，这对他都是全新的。

回莱登后，Golius 发表了“论中国循环和节气名称等”，作为卫匡国《中国全舆图》的附录。很明显，这份东西受利益于卫匡国的解释。文章里的汉字是荷兰所做的首次中文印刷，事实上这也是欧洲第一次正确印刷汉字。

与卫匡国的《中国全舆图》一同出版的还有他的《鞑靼战纪》(De Bello Tartarico)^③，叙述的是满人对中国的征服，这后来成为荷兰诗人冯代尔 (Vondel)^④ 撰写剧本 *Zungchin* 时的素材，描写的是明朝的覆灭。该剧本直到 1667 年诗人 80 岁时才出版。鉴于卫匡国在阿姆斯特丹延长逗留时间，并和出版者 Blaeu 建立了联系，那么作为 Blaeu 的朋友，冯代尔很可能亲眼见到了卫匡国。他可能通过与这位有意思的耶稣会士的接触，受到了这个罕见题材的鼓舞。

迷恋中国问题的另一个学者是 Isaac Vossius (1618—1689)，他是 Golius 和 Salmasius

^① 卫匡国 (1614—1661)，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1643 年来华，大部分时间在杭州传教。

^② 鄂本笃 (1562—1607)，葡萄牙耶稣会士，1602 年 10 月从印度出发，于次年抵达中国新疆，2 年后又抵达肃州，死于该地。

^③ 此书的中译文收入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1985 年版，第 1-68 页。

^④ 冯代尔 (Justus van den Vondel, 1587-1679)，荷兰诗人、人文学家，被誉为荷兰黄金时期最伟大的诗人。

的学生，也关注中国的编年制，但不是从技术方面而是从历史方面着手。他属于思想批判派，用所闻的中国古老历史来唤起人们对圣经传统的怀疑，实际上他是怀疑和轻信的奇特混合。查理二世（Charles II）提到他说：“这个博学家非常出色，他相信一切，除了圣经。”1660年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论真正的古代世界——世界要比通常测定的长 1440 年》（*On the True Antiquity of the World, in which it is shown that the World is at least 1440 years older than is generally computed*）。他对中国无限崇拜，在此书第 11 章的头里这样写道：中国人是有史以来最博学的人，有 4500 年连续的历史，有比摩西（Moses）^①更早的先知和立法者，他们完全独立生活和发展，与周围的邻居没有接触。他们不知道战争是什么，完全顺其自然，尽情欢乐，就这样不为人知地过去了 4000 年。然而 400 年前蒙古人入侵了这个国家，马可·波罗等人在那时访问过它，归来后叙述了许多关于它的精彩故事，但人们却不相信。那时没有人能证实他们的话，因为出访者很少，而且真正进入该国的人更少，从没有人期望能够回来。“我认为他们不会回来，因为他们被那里人们的美好品质以及温和、仁慈的气氛迷住了，享受着中国人的快乐，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祖国和朋友。”Vossius 甚至还提及了将中国地理介绍到西方的卫匡国。当后者准备回中国时，他有关中国人的美德所写的东西，要比他感受到的，以及向朋友承认的含蓄得多。“对他来说，本国就象是一块流放地，如果他不能再去中国，那很快就会死的。”

这种对中国的思恋确实意味深长，本土的人们都众所周知。

在他的另一本书《博闻》（*Variarum observationum Liber*）里，有两章是关于中国的，其中充满了对中国庞大的人口以及科学艺术诸领域伟大成就的崇拜。中国人在医学、植物学、药理学、建筑、音乐、绘画、雕塑方面居于领先地位，他们发明了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只有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似乎落后于基督教世界。

这就是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理想化构想，这在 18 世纪是一种时髦，在法国哲学家中间尤其如此，甚至今天还没有完全消退。这副图画确凿地表明，有可能存在着比我们更高的文明。在与教会统治的长期斗争，这是一把武器。尽管其本身是无批判力的，却代表着一种批判态度，即挣脱旧有枷锁的思想。汉学研究确实意味着新大陆的发现，是一种构建新哲学的强有力因素。

Vossius 是一个漂泊的学者，他曾为瑞典克里斯蒂娜女王（Christiana, 1626—1689 年）服务，为她收集珍本和手稿。但他的报酬似乎总是被周期性地拖欠，以致他好象采用一种借书不还的方式来加以报复。无论怎样，当他去世时，已拥了一个巨大而重要的图书馆，收有书籍和手稿。莱登大学很幸运地得到了它，从而构成珍贵的经典手稿收藏的基础。其中尽管只有一本中文书（现在在我们手上），但却有大量早期传教士关于中国的出版物。我经常有机会参考，书上有熟悉的印记 *Ex Bibliotheca viri illustrissimi Isaaci Vossii*（意思是来自 Vossius 图书馆）。我得向敝校这位东方学术的头号创建人致敬，尽管他在那里从未得到一个职位。

如果说我们很幸运地得到了 Vossius 的图书馆，那么失去 Golius 的藏书则是令人遗憾的。Golius 希望在其死后，莱登大学能接过其东方手稿的全部收藏，同时能给他的后人以合理的补偿。在学术圈，尤其是启蒙时代，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遗憾的是，一直未能筹措到这笔经费。最后，在他去世后约 13 年即 1698 年，其藏书不得不在莱登公开出售。阿马郡（Armagh）大主教 Narcissus Marsh 购得了一大部分，幸运的是，他后来将其留给了波德林图书馆。售书的目录现在还在，这表明 Golius 的中文藏书确有一定数量，他并没有夸大其词。在遇到卫匡国之前，他就有了几本，后来卫氏又赠送了一些。其中 16 个门类是手稿，19 个门类是中文印书，包含 80 多本书。要知道在 1647 年以前巴黎的国王图书馆也只有 4 本中文书，那么这一数量确实是很客观的。这些书有一些仍在我们的图书馆里，并没有全部去牛津。

Heurnis 的词典也没有去，和基督教概论及其他手稿被一个叫 Phillippe Masson 的人得到

^① 摩西，《圣经》中的人物，曾率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

了，他是法国教会在荷兰的牧师。Masson 和乌特勒支（Utrecht）大学的 Reland 教授联系，后者是一位享有盛名的东方学家，特点是在解释旧约的疑难词句时使用了同源语。这种方法自身是优秀的，但也有巨大的危险，因为构成语言亲疏关系的观念还是很模糊的。然而 Reland 持这种流行的观点，即希伯来语——伊甸园的语言，是最古老的语言，他将其视为欧、亚、非大多数语言的原始语。

对中国怀有兴趣的 Masson 被一本精彩的出版物所唤醒，那是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基歇尔（Kircher）^①的《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于是他产生了一种想法：既然汉语也是非常古老的语言，那么用汉语去解释希伯来语，也许是可能的。依靠 Heurnius 的词典，1713 年 Masson 大胆地对希伯来语和汉语作了比较。

他的结论很不可靠。例如，他说上帝供给沙漠中的犹太人的 manna，和汉语馒头的“饅”是同一个字。他如此解释令人迷惑的《创世纪》第 49 章第 10 节：“圭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等细罗（Shiloh）来到，万民都必归顺。”他认为 Shiloh 就是汉语的“时乐”，而“时乐”也许源于 Messiah（弥赛亚，犹太人盼望的复国救主）。这一点应当和《路加福音》第 2 章第 10 节相对照，那句是：“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

Masson 和巴黎国王图书馆的经理 Abbé Bignon 进行了联系。那时有一个叫黄家略（Arcadius Hoang）^②的中国人正在该馆工作，旨在解释传教士们放在那里的中文书。Bignon 将 Masson 的文章给黄看，也许正是 Masson 所期望的，黄阐述了一些批评。面对这篇广博的论文，他肯定感到非常为难。

阅读这篇试图将希伯来语和汉语加以联系的文章，我们禁不住会发笑，但这是不应该的。Masson 将他的手稿给 Reland 看，后者不是一个平庸的学者，既然他认为此书写得不错可以出版，那么我们也应该好好想一想。鉴于那时的神学观，以及尚未有比较语言学，Masson 的做法也似乎是合理的，完全符合逻辑。经过了类似的失败，更好的方法慢慢地发展起来。但是即使是今天，一些出版物中仍毫无根据地将汉语和其他语言作比较。如果这么做在过去是可以谅解的，现在则不能被容忍了。

Heurnius 词典后来的处境是如此离奇和意想不到的。它被 Masson 的儿子带到伦敦（后者是 Wheeler 街法国教会的牧师），然后同 Golius 图书馆的其他手稿一起淹没在大英博物馆里，只到今天已经被人遗忘了。

Masson 的研究是汉学研究的极端例子，他过于经院化而与现实生活脱节。幸运的是，荷兰对汉学研究另一个方面的贡献是能充分地体现出固有的现实感。

他们在东印度建立基地后，将巴达维亚建成为贸易中心，并且从未放弃与中国直接贸易的希望。各种构想拙劣的企图都尝试过了，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想要与之打交道的国家和马可·波罗所说的 Cathay 帝国是同一国家。他们逐渐对中华帝国在远东的确切位置有了一个更明了的认识。当满洲人征服这个国家时，他们决定尽力与之建立友好关系，以期得到贸易保护权。

于是在 1655 年，他们向北京派出了以杯突高啮（Pieter de Goyer）和惹诺皆色（Jacob de Keyzer）为首的使团，并于次年抵达北京。使团行程贯穿于广州到北京的全部里程，一个叫尼尔霍夫（Johan Nieuhoff）的团员对此做了完整的描述，广泛地涉及了这个大国。他的书 1665 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③，随即被译成法、德、英文，甚至还有拉丁文，成为关于中国的一部经典著作，其中充满了许多关于中国的前所未闻的信息。使团没有达成自身的目的，它

^① 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 1601-1686），德国汉学家。

^② 黄家略，福建莆田人，出身于天主教徒之家，1702 年随巴黎外方传教会成员梁弘仁赴欧，到过罗马，长期在巴黎生活工作，1716 年去世。

^③ 书名是 *Gesandchap der Nederl. Oost-Indische Compagnie aen den grooten Tatarischen Cham, den Keyzer van China*。

被视为一个朝贡团，荷兰仅被允许每 8 年进贡和贸易一次。使团的总花费净计 88085 盾又 6 便士，其真正成果是尼尔霍夫的书，完全物有所值。

与此同时，中国海岸的荷兰人已经卷入了满人与明朝残余势力的斗争。郑成功，一个精力充沛的海上强人，多年来一直是南中国海的主人，他的基地在厦门。在（清军）强大的压力下，他决定将基地迁往台湾。要知道荷兰已经在台湾建立了一个繁盛的贸易中心，它对与日本的贸易至关重要。1662 年郑成功夺取了它，成为台湾之王。一支荷兰舰队赶到现场，但为时已晚，来不及救援了，于是它同满清进行了合作。后者积极对付郑成功及其后继者。当厦门和其他几个城被攻占以后，荷兰人到福州晋见（清朝）总督，为的是能向他提供舰队援助。

期望这些军事援助能得到回报，1665 年另一个以 Pieter van Hoorn 为首的使团从福州出发来到北京。他们在那里呆了 40 多天，结果无功而返。然而最大的收获是 O.Dapper 写的关于此行的概述^①。他也很快被译成德文和英文。

后来当清朝皇帝于 1883 年亲征郑成功在台湾的残余力量时，他召集荷兰人作为忠实的附庸，用舰队援助清军行动。尽管荷兰人响应了号召，但来得太晚，没来得及派上用场。为了使自己的忠诚行为获得奖赏，他们又一次派出了以 Paats 和 De Keyzer 的使团。1686 年使团抵达北京，但它的经历并不比先驱们更好。不幸的是，使团的记录从未出版，而且现在也遗失了（有可能在大英博物馆），因此那时的汉学研究没有什么大的成果可言。

不过使团的记录并没有马上遗失，它被一个非常出色的、真正的学者所用，他就是 Nicholas Witsen，是阿姆斯特丹的市长。他在莱登学习过，受过 Golius 的影响。作为俄国问题专家，他成了彼得大帝的挚友，其主要兴趣是西伯利亚、蒙古和满洲，而不是中国问题。然而在他的巨著《东北鞑靼》（*North and East Tartary*，1692 年首版，1705 年二版）中有许多关于华北的信息。Witsen 并不是纯粹的编辑，他批判性地用了别人写的东西，他和能提供第一手资料的人建立了联系，例如北京的佛兰德教会。他的书达到了那个时代相当准确的水平。

Witsen 还用荷兰语编辑了另一个使团的记录^②，它是 1692 至 1694 年由俄国沙皇派遣，以伊台斯（Ysbrandt Ydes）^③为首的。该使团途经陆路，收录了大量有关亚洲人迹罕至地区的新奇信息。

由此联想起另一次旅行的记录，真是令人扫兴！它理应被记录下来，但却没有。此书应该由 Samuel Van de Putte（1690—1745）来写，他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忘记，但只要知道他是 18 世纪最伟大的荷兰旅行家。不幸的是，当他游遍全亚洲准备返回荷兰时，在巴达维亚病倒了，并死在那里。按照他的遗愿，他的笔记和文稿都被烧掉。唯一的遗作是一本无关重要的提交给莱登大学的博士论文，有关一些次要的法律问题。

Van de Putte 在经历了几次初步的冒险后，于 1721 离开荷兰到国外，直到 1745 年去世。他走访了波斯、印度、锡兰、尼泊尔和西藏，在拉萨呆了很长时间，然后通过青海湖（Kokonor）抵达北京。宋君荣神父（Father Gaubil）^④在 1753 年的一封信里，叙述了他的北京之行，也提到了他是如何赢得西藏喇嘛的好感，并亲自了解西藏人的。在现存的 Van de Putte 的唯一一封信里（可能写于 1732 年），他说了自己是如何化装成中国人，作为一个高级喇嘛商队里的骆驼骑手，骗过了长城的守卫。后来，他似乎又从西南这条线返回了西藏。

18 世纪荷兰关于中国的知识增加得很少，他们似乎或多或少忘却了 17 世纪的先辈做出

^① 此书是 *Gedenkwardig Bedryf der Nederl. and. Oost. Indische Mutschapye of de Kuste en in het Keserriyk van Tainsing of Sina. Amsterdam, 1670, 2 vols.*

^② 指的是 *Driejaarige reize naar China, etc. Amsterdam, 1704.* 中译文见伊台斯、勃兰德著、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翻译组译《俄国使团笔记》，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③ 伊台斯（1660—？），德国人。

^④ 宋君荣（1689—1759），法国耶稣会传教士，1721 年来华，主要在北京活动。

的重要贡献。他们满意地坐在中国式的亭子里，按照中国的式样裱护房间。从中国茶杯中品茶，杯子是代夫特（Delft）产的，是模仿中国的赝品。于是法国成了真正的汉学中心。

只有一个明显的例外，那就是荷兰又一次重复了派遣赴华使团的努力，一个重要的旅行记录又一次成了净赚的成果。那是在 1794 至 1795 年，即马噶尔尼（Macartney）使团^①回国后不久，荷兰使团由德胜（Isaac Titsingh）和范罢览（A.E. van Braam Houckgeest）率领，前者是荷兰在日本的基地出岛一家工厂的头，也是一位出色的日本学专家。

范罢览为东印度公司工作，与中国有着多年的贸易往来。1774 年他退休后返回荷兰，作为一个乡间绅士安顿下来。很明显，作为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他对美国的独立热诚地予以认同。1783 年他和妻子及 5 个孩子移民到美国，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建立了一个粮食种植园。次年成为美国公民。此后，他有 4 个孩子死于传染病，由于轻信又失去了部分财产。命运的沉重打击迫使他到东印度公司去寻找一个新的职位。1790 年他作为贸易主管来到广州，正是他建议派遣这一使团，并利用自己的全部影响促成了此事。

在这里，我不能放开谈使团非常有趣的冒险经历。当他们最后返抵广州时，获得了一封回信，是致不存在的荷兰国王。政治形势已迫使他们不能坐船回国，于是范罢览决心去接纳他的美国。他把自己的货物和私人物品运上一首 200 吨的英国小船，他是此船的所有者之一。他亲自驾船开始了赴费城的航行，并于 1796 年 4 月 24 日抵达那里。

费城在那时是这个新国家的首都。范罢览的到来似乎引起了巨大的喜悦！他刚刚去过中国宫廷，带来了一大批中国古玩，各种货物、服饰和绘画等，还有 5 个真正的中国人为他服务。毫无疑问，他成了一个浪漫的形象，以致一段时间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费城那时是许多高等法国人的避难地，有奥尔良公爵（Duke of Orleans）、沃尔尼大臣（Count de Volney）、塔列朗（Talleyrand）等人，范罢览和他们有所过从。他很快在费城的乡间找到了一处乡舍，将它命名为 China's Retreat。一个法国书商和出版家 Moreau de St—Méry 敦促他撰写赴华使团的记录，该书后来用法文出版^②，说是献给乔治·华盛顿的。

这个版本经常遭遇厄运。1797 年他将第一册的 500 本用一艘美国船运往英国，但此时美法关系已经破裂，这艘船被法国武装船只俘获了。一个法国书商将其买下了全部，他很可能会对其造成损害。果然，他将第一册的内容分成两个小册，并将其敷衍成全本。因为广告已说过该书共有两册。就是这个“海盗”版被译成了英文、德文，甚至还有荷兰文，并广为发行。费城版的第 2 册找不到市场，因为第一册已经消失了，因此该书的全本极为缺乏。

范罢览似乎一直被厄运尾随，他显然发现在费城继续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驾着四匹马拉的马车，伴随有一个中国车夫和带着粉末装假发的侍者——是不可能的。1798 年他渡海来到伦敦，出售了自己的收藏。我们很幸运地得到了克里斯蒂（Christie）拍卖行的销售目录，尽管其中没有列出一本有关中国艺术的书籍，但还是理所当然地收录了许多有意思的物品。通过销售，它们被分散开来，但直到今天，许多来自这个收藏的物品仍能被追寻出来。当然，这对荷兰汉学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但那个时代的政治条件就是这样，以致不能将它们完整地保留在博物馆里。

1801 年范罢览回到荷兰，并于同年去世。

现在我们来谈新的也是最后的一章，垂死的荷兰汉学似乎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获得了振兴。它迫使我不得不完全改变论调，而其关键则在于日本人。

我得回顾一下几个世纪以来，荷兰是如何将日本的出岛建为自己牢固的立足点的。荷兰是日本唯一与之贸易的西方国家，这完全是日本自己的选择。通过荷兰，日本获得了一些西方的科学知识。一些人规律地学习荷兰语，并充当翻译。遗憾的是，总体上荷兰对日本文

^① 1792 年 9 月由马噶尔尼（Earl Macartney）爵士率领的英国使团出使中国，于 1794 年初返国。

^② 书名是 *Voyage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Orientales Hollandaise vers l'empereur de la Chine dans les années 1794 et 1795*.

明并没有多少学术上的兴趣。偶尔有些人作为医生来到出岛，研究日本的植物。例如 **Kaempfer**(1691—1692)和 **Thunberg** (1775—1776)，但他们一个是德国人，另一个是瑞典人。德胜几乎是唯一一个充分利用机会的人，他成为一个真正的日本学学者。

到 1823 年有一个名叫 **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 的年轻人抵达出岛，他生于德国的维尔茨堡(**Wurzburg**)，后来为荷兰服务。最初他就对日本研究怀有浓厚兴趣，决心献身于此。日本的每个事物都令他着迷，无论是特殊的动植物，还是制度、宗教、生活方式和习惯。通过传授西方的医学和科学，他结识了许多日本友人，后者提供给他各式各样的信息，为他收集到各种有意思的物品。他去过江户幕府将军的宫廷，看到和学到了大量的知识，有许多他最后也没用上。但 1828 年末，他遇到了一个大麻烦，有人发现他占有一些地图和若干其他物品，而这些都是禁止外国人获取的。一个冗长的调查报告之后，几个日本朋友受到牵连，一些人丧了命，他自己则于 1829 年被永远驱逐出日本。

带着自己相当可观的藏书——主要是关于植物学和民族学的，**Siebold** 回到了荷兰，在那里开始了新的经历，而这与我们有关系。

因为南部有些人对种植日本植物的可能性怀有兴趣，所以 1830 年 7 月他来到了安特卫普的一家旅馆。旅馆内有一个名叫 **Johann Joseph Hoffmann** 的年轻客人，他 1805 年出生在维尔茨堡在当地的大学里受过良好教育，成绩优秀，而且具有绘画和演唱天才。他参与组织了一个巡回戏剧团，恰好此时也在安特卫普。一天晚上，在这家旅馆的公共间里，他偶尔听到两个客人在对话，其中一个说的是德语，但夹杂着法语、荷兰语和马来语，谈的是日本问题。共同的乡音使两人结识了，他很快确信这位陌生人不是别人，正是听闻已久的同乡 **Siebold**。他们相互介绍，对方果然是 **Siebold**。随后是一番入夜长谈，**Hoffmann** 被迷住了，以致就地决定放弃自己的艺术生涯，去学习日语，做 **Siebold** 的助手。

Siebold 住在莱登，他希望在此培养对植物学的兴趣，并得到专家的帮助。他创建了一个植物园，有一间大房子陈列自己的藏品。在那个年代，这些东西是独一无二的，顺便一提的是，它构成了现在人类文化博物馆的核心。**Siebold** 从巴达维亚带来了一个叫郭庆常(音，**Ko Ching-chang**)的中国人，**Hoffmann** 的首要任务就是向他学习汉字。

这是现代莱登汉学研究的真正开始。很能干的 **Hoffmann** 多年来一直学习日语和汉语，并作为 **Siebold** 的助手。在工作中他经常被巨大的难题所困扰，但随即受到了巴黎儒莲(**Stanislas Julien**)^①教授的诸多鼓励，后者是那时最伟大的汉学家。然而最后 **Hoffmann** 与 **Siebold** 的合作开始变得不那么愉快了。**Siebold** 富有天才，一定是个难以相处的人，他不知疲倦，富有雄心和独断。顺便说一下，自日本开关后，他又去了那里，1859 至 1862 年呆了 3 年。虽然受到了巨大的尊敬，但再一次的失望也是免不了的。

而 **Hoffmann** 则开始走运了。1846 年伦敦的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正在招募一个教授的席位，为了找到合适的人，他们向儒莲征求意见，儒莲马上推荐了 **Hoffmann**。所以他被邀请前往就任。就在他准备赴任之时，荷兰人终于觉醒过来，意识到应该将这位优秀的学者留在荷兰。于是荷兰国王授予他日本学翻译官的称号。**Hoffmann** 留了下来，几年后，即 1851 年被莱登授予教授称号。

虽然 **Hoffmann** 作为学者的主要研究成绩在日本学方面，但他也为汉学研究打下了基础。他尽其所能收集了许多书籍，1860 年还致力于铸造一套完整的汉字字模。为了他能够印日文入门书，政府为这套字模出了资。在那个时代，汉字印刷真是极其艰难，**Hoffmann** 不仅自己刻汉字，还亲自充任排字工人。这套字模迄今已用了近 100 年，**Brill** 东方出版社的汉字也是从这些字模中铸造的。它为欧洲汉学作出了巨大贡献，我记得翟理思(**Giles**)大字典的第二版^②也是在莱登印制的。

^① 儒莲(1799—1873)，法国汉学家。

^② 翟理思(**Herbert A. Giles**, 1845-1935)，英国汉学家。这里指的是他的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汉

Hoffmann 也教汉语，有一个名叫施古德（Gustav Schlegel）的学生，很不寻常。施古德的父亲是植物学教授，曾帮助 Siebold 和 Hoffmann 研究日本植物。Hoffmann 是施古德一家的朋友，施古德只有 9 岁时就请 Hoffmann 教自己汉语，这是在 1849 年。施古德进步很大，几年以后，当荷兰政府希望选一个年轻人去受训，以便为东印度公司充当汉语翻译时，Hoffmann 推荐了年轻的施古德，所以他 14 岁就被任命为官助的翻译学生。17 岁那年他被认为是已足够成熟，可派到中国去继续学习。他在华南呆了 3 年，直到 1872 年，主要在澳门、厦门、广州为东印度公司服务。后来因健康不佳而回国，1875 年被任命为莱登大学汉学教授，任至 1903 年。他绝对是个多才多艺的作者，一个典型的先锋。要列举他的著作，那是太长了^①，其代表作有关于中国天文学^②、秘密社会^③的论述，以及四大册的荷华词典^④。1890 年他和法国学者高第（Henri Cordier）^⑤一同创办了汉学期刊《通报》（*Toung Pao*）。伯希和（Paul Pelliot）^⑥曾这样告诉我，他认为施古德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是培养了一些能从事汉字排版的印刷学徒，这些人的学徒至今还在世。施古德有点好斗，由于他非凡地在早年就掌握了汉语知识，所以极为自信，认为在汉语方面无人可及。尽管他的知识相当可观，但不幸的是，中国研究的性质决定了即使是最好的学者，也有极大的可能犯错误，施古德当然不是永远都正确的。

在印度尼西亚时，施古德是研究中国事务的专家之一，他们关注的是中国人拓殖南洋的历史。其中的一些人已经为汉学研究做出了贡献。Francken 和 De Grijs 编撰了厦门方言词典^⑦，Groeneveldt 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关于马来群岛的中文著作》（*Notes on the Malay Archipelago, compiled from Chinese sources*），对于初学者了解这一地区的早期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他也开始研究荷兰与中国的关系，不幸的是只出了一册书。Hoetink 关于中国人早期拓殖爪哇的研究应当被提一下^⑧。商克（Schaank）的语音学研究^⑨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受到了高本汉（Karlgren）^⑩的好评。

葛罗特（J.J.M.de Groot）也是中国问题的研究专家。他师从施古德若干年后于 1876 年前往厦门，一年之中他收集了资料，出版了两大册关于中国节日的著作^⑪，先是用荷兰文，后来又用法文。他在东印度呆了一些年，成名之后，受政府允准前往中国呆了很长一段时间，为的是研究宗教、习惯和风俗。这次旅行从 1886 年直至 1890 年，其成果是关于中国宗教的六卷本英文巨著^⑫，以及该领域的其他著作。回荷兰后，他被任命为莱登大学人类文化学教授。1903 年施古德去世后，他当然地接任为汉学教授。

后来他的兴趣改变了，开始研究中国和匈奴的早期历史，从中国史料中辑译出 2 卷本的相关资料^⑬。1912 年他受邀到柏林，希望能在那里开阔工作的眼界。他去世于 1921 年。

英字典》）1912 年修订本。首版是 1892 年上海版。

^① 施古德的著作目录可见《通报》（*Toung Pao*）1903 年第 403 页。

^② 指 *Sing Chin Khao Youen, Uranographie chinoise*（《星辰考原——中国天文志》，1875 年版）。

^③ 指 *Thian Ti Hwui, the Hung-League, or Heaven-Earth-League: A Secret Society with the Chinese in China and India*（《天地会：中国和荷属东印度华人社会中的秘密社会》，1866 年版）。

^④ 指 *Nederlandsch-Chineesch Woordenboek*（《荷华文语类参》，1882 至 1891 年版）。

^⑤ 高第（1849—1925），法国汉学家，1869 至 1879 年在华。

^⑥ 伯希和（1878—1945），法国汉学家。

^⑦ 指 *Chineesch-Hollandsch Woordenboek van het Emoi Dialekt. 1882*。

^⑧ 指 *Kapitein der Chineezzen te Batavia in 1740*，刊 Bijdr. T., L. en Volk. v. Ned. Indie, D. 74, 4 afl., 1918, pp. 447-518。

^⑨ 指 *Ancient Chinese Phonetics*，连载《通报》（*Toung Pao*）1897、1898 年；*Het Loeh-foeng-dialect*, Brill, 1897。可参见罗莘田：《评商克的古代汉语发音学》，《岭南学报》第 7 卷第 1 期（1947 年），第 15-35 页。

^⑩ 高本汉（1889—1978），瑞典汉学家，以《中国音韵学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1915-1926*）享誉世界。

^⑪ 指 *Jaarlijksche feesten en gebruiken van de Emoy-Chineezzen*（《厦门华人的年节和风俗》，1881 年）。

^⑫ 指 *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中国的宗教制度》，1892—1901 年版）。

^⑬ 指 *Die Hunnen der vorchristlichen Zeit*（《公元前的匈奴》，1921 年版）、*Die Westlande Chinas in der vorchristlichen Zeit*（《公元前的西域》，1926 年版）。

施古德和葛罗特都大大扩展了大学里的汉文藏书，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是自学成才的商人 F.G.Kramp 的图书馆。Kramp 的想法是追随 Witsen 开创的“鞞鞞”研究，他的出版物很少，但其优秀的藏书于 1913 年和 1918 年先后入藏莱登大学，从而为荷兰汉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1912 年葛罗特离开了莱登大学去柏林，没有人能够接替他。那时决定凑合着找一个什么人来，也许可以充当讲师。1919 年一个年轻人以如下的能力就任了，他初步学习过哲学和语言学，曾师从葛罗特，在巴黎和柏林工作过，当过大约 5 年荷兰驻北京使团的助理中文秘书。任命一个还未发表过只字片语的年轻人确实是个极大的冒险，他没有学位，因为那时研究汉学还不能授予学位。就是这个年轻人，现在已经不年轻了，他正在对你们作演讲。毫无疑问，将来会有人来讲述关于他的许多趣事，届时我希望能够到场聆听。

[口述者简介] 戴闻达（1889—1954），荷兰汉学家。

[整理者简介] 马军，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